

琮的生命，从良渚到现代

杭侃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上述四句诗出自白居易的《放言》，其中提到的“钻龟与祝蓍”是两种古老的占卜方法。钻龟即用龟甲钻孔烧灼以观吉凶，这种龟甲上写的文字，就是近代王懿荣发现的甲骨文中的一种。

这种占卜方法在民间一直流传。1994年，重庆云阳县明月坝遗址唐代地层中出土了3件龟腹甲，甲上施圆形的钻孔，有的有灼，有的无灼，正面有兆枝，但未见卜辞。明月坝出土的龟甲很可能是当地居民求雨所用。唐代诗人刘禹锡在一首诗中写道：“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即是描写三峡人为求得播种的最佳时机，利用龟甲占卜以求雨。

这种风俗宋代还有，李复在他的《夔州早》中就说：“夔人耕山灰作土，散火满山卜龟雨。”龟卜在唐宋依旧盛行，所以白居易能够将这种方法写到自己的诗中，唐太宗贞观九年曾经下诏“龟易五兆之外，诸杂占卜，亦皆停断”，说明龟卜还被官方认为是一种比较正统的占卜方式。宋太宗年间编纂的《册府元龟》，书名也保持着龟甲占卜的记忆。宋代以从事迷信职业的人很多，王安石曾经说仅开封一地，卜者就“以万计”，其中应当不乏以龟卜谋生者。

祝蓍占卜不为今人所知，但是这种占卜方法的历史同样悠久。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龟策列传》，列传中对蓍草占卜有非常详细的阐述：“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闻蓍生满百茎者，其下必有神龟守之，其上常有青云覆之。”

蓍草是一种多年生菊科草本植物。古人占卜所使用的蓍草，是秋后采制的蓍草的干枯棱柱形茎秆，其状直且硬。西晋张华在《博物志》中说：“蓍千岁而三百茎，其本已老，故知吉凶。”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的“历代蓍草论”认为，“蓍乃蒿属，神草也。故《易》曰：蓍之德，圆而神”。明代王世贞辑、汪云鹏补的《有象列仙全传》一书中，绘有书房内读书的文人，案头摆放着插着一束蓍草茎的蓍草瓶。

明代晚期复古思潮盛行，不过与宋朝的复古是为了振兴儒学不同，明代的复古更多反映的是明朝文人对“纵乐的困惑”。新加坡学者康格温在《〈园冶〉与时尚：明代文人的园林消费与文化活动中》，就专辟一节讨论“文人的焦虑”。在晚明日趋奢华的氛围里，在时局的纷争与命运的不定之中，晚明的文人通过复古等活动，标榜身份认同，在忧虑之日、彷徨之时，一介书生抽一把蓍草，大概也能抚慰一下焦躁的心情。

熟悉玉器的朋友一望便知，这件蓍草瓶与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多节琮非常相像，所以，现在的学者多以琮式瓶来称呼这种形制、不同质地的瓶。多数学者认为良渚文化的玉琮是通神的法器，表现了良渚人的宇宙观，具体的认识和解读又因人而异。这种器型在历史的长河中时隐时现，绵延不绝，从新石器时代的玉琮，到明代的蓍草瓶，似乎又有一种隐藏的脉络将它们相连，让人不得不思考民间知识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

这种内圆外方的筒型玉器，在新石器时代的许多文化中能够看到，如学者许晓东所言，这些玉琮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以良渚文化玉琮为代表，表面装饰神人兽面图案，孔径有大



故宫博物院藏南宋龙泉窑青瓷琮式视觉中国供图

小之分，小孔径的琮目前看为良渚文化所特有；一类以华西地区的齐家文化玉琮为代表，表面多光素，或装饰弦纹，孔径相对较大。即使是良渚文化的玉琮形器，有内圆外方者，也有作圆筒形甚至带盖者，大小、形制、出土部位以及伴出器物有的并不相同，因此被区分为琮、柱形器、筒形器、管类器，暗示着其功能的非单一性。可以说玉琮形器在其作为“物”使用的年代，对它的理解就是多义的。

在崇尚“中兴复古”的宋代，琮式器物又有了较多出现，如四川发现的30多处南宋窖藏中，就有3处发现了青釉琮式瓶和龙泉窑烧制的琮式瓶。这些琮显然不是作为礼器使用的。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南宋杜良臣的《致中一哥新恩中除贤弟尺牋》中，笺纸的底纹上印制了一只放在方座上的琮式瓶，瓶中有一朵盛开的水仙。琮式瓶的插花功能延续到了明清，在明代的几种花谱书籍中都有记载，如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如堂中插花，乃以铜之汉壶，大古尊罍，或官哥大瓶如耳耳壶，直口敞瓶，或龙泉蓍草大方瓶……若书斋插花，瓶宜短小……青东磁小蓍草瓶……俱可插花。”

至于插花的琮式瓶为什么在明代被称为蓍草瓶，台湾学者谢明良在《琮瓶再议》中推测“将琮瓶称为蓍草瓶，既有可能是明代人观察到南宋琮瓶瓶身边角两侧所见类似八卦爻画引发的联想，也不排除蓍草瓶之称谓本身竟是来自宋代”。

玉琮是中国古代一种富有文化内涵的器物，现收藏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中，对它的解读有不同的角度。既有对它最初使用本义的探讨，如良渚玉琮的原始含义，其与齐家文化玉琮的联系和区别；又有它作为“古物”之后的存在方式与意义，如是花瓶还是蓍草瓶？还有琮进入博物馆、成为“藏品”之后，我们对它的阐释；更有琮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出现在今天设计的建筑、装饰、生活用品上的重构。

人的生命有多种解读，物的生命也有多种解读。



元代书法家俞和《篆隶千字文》。资料图片

形与字音、字义相对照的手册，便于使用者温习、查阅。因此，背诵《千字文》便成了旧时所有儿童就学后的必修课，甚至成了古人基本文化素养的一部分。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用《千字文》的文字顺序来给事物编号，从“天”字（第一号）、“地”字（第二号），依次排序。例如科举考场的号房，通常都是按照千字文进行排序，考生只要知道自己的字号，就能很方便地找到所处的位置。其他数目较多的官方文书、商家账簿乃至书籍卷册等也常用《千字文》来编号。这样的排序方式显然要比简单机械的数字编号更容易记忆，也更有趣味。

很多人还喜欢用《千字文》来游戏取乐。例如，唐高宗时画家阎立本为右相，武将姜恪是左相，有人就引用《千字文》的句子说：“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表面上是夸赞，实际却是在讽刺他们并非真正的相才。还有人用《千字文》来做“歇后”（或称“缩脚”）游戏，如隋代侯白《启颜录》中就有人这样嘲笑他人：“面作‘天地玄’，鼻有‘雁门紫’，既无‘左达承’，何劳‘罔谈彼’。”（分别歇去“黄”“塞”“明”“短”字）。这些都反映出古人对《千字文》的熟悉程度。

事实上，在《千字文》出现之前，社会上就已经有了一本广泛使用的识字教材，



1906年，模仿《千字文》的《正音绘图增注六千字文》。资料图片

这就是西汉史游所撰的《急就篇》。该书收入两千多个汉字，按照语义类别进行分组罗列，编排成若干整齐有韵的句子，并且也很少重复。但《急就篇》整体上是零散的，不是一篇完整的文章。相比之下，《千字文》不但收入的文字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基本汉字，而且在内容上是一个语义连贯、主题明确的整体，是一篇文质兼美的文章，这些优势使得它很快就取代了《急就篇》。到唐代以后，《急就篇》就很少有人使用了。

《千字文》被称为“千古奇文”，之所以奇，主要是因为它的创作难度极大：它所使用的一千个汉字基本上是零散的，彼此之间在语义上并没有必然的关联，而所完成的文章不但要毫无重复，毫无遗漏地使用这一千个汉字，而且还要文理通畅、浑然一体。这样的工作，即便是在今天，有了计算机的帮助，也是很难完成的。而周兴嗣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篇奇文，一方面有赖于作者敏捷的才思和全盘规划、周密安排的高超能力，另一方面也与汉语本身具有高度的弹性和灵活性密切相关。

《千字文》既是一篇文章，又是一篇识字教材。识字教材的基本单元是独立的汉字；而文章的基本构成元素则是词语。《千字文》充分利用了汉语中字和词关系

我看我说

传统文化为何越来越“潮”

季芳芳

年轻一代将现代元素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作和传播中，不仅给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达带来了崭新面貌，也为文化传播注入了新的灵感与活力

“传统文化原来这么潮！”近年来，这样的感叹越来越多。年轻人穿汉服，复刻古代饮食，以古典民族乐器演奏时下流行歌曲，用3D引擎等工具复原长安城……种种新时尚，显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与时代活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受年轻人喜爱，因其符合他们的审美需求和价值观。一方面，他们对于优秀传

统文化的热爱与文化自信紧密相连，希望借助数字时代的多样渠道，亲近和感受古典文化的魅力。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成为年轻一代表达态度和个性的方式。

年轻一代将现代元素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作和传播中，不仅给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达带来了崭新面貌，也为文化传播注入了新的灵感与活力。

互联网平台为文化创意提供了广阔舞台。年轻人是优质内容的生产者。一方面，从细致入微的缙丝制作教程到惊艳的汉服变装，他们通过社交媒体、视频分享网站和在价值观。一方面，他们对于优秀传

统文化的热爱与文化自信紧密相连，希望借助数字时代的多样渠道，亲近和感受古典文化的魅力。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成为年轻一代表达态度和个性的方式。

年轻一代将现代元素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作和传播中，不仅给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达带来了崭新面貌，也为文化传播注入了新的灵感与活力。

以一警百

常雪莹

和震慑作用。《盐铁论·后刑》有云：“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同样，通过“惩”的手段，发挥“警”的作用，即以“前”警示“后”，以“小”警示“大”，以“少”警示“多”。

“以一警百”蕴含着取舍之道，在利与害、多数与少数之间，除害而兴利，通过惩治极少数来警示教育大多数。北宋名臣范仲淹改革吏治时，苦于地方上无得力之人监督实施，于是就拿来监司名单一一审查，“视不才监司，每见一人姓名，一笔勾之，以次更易”。私密使富弼在旁边提醒他说，你一笔勾之很容易，难道不知会导致一家哭吗？范仲淹回答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意思是说宁可得罪一家，不能让一个地区的百姓受害。正所谓：“农夫不耨无用之苗，无用之苗，苗之害也。”锄一害才有众苗成，不锄掉无用之苗，就会妨害好苗的成长，进而影响到整个庄稼，只有敢于把“无用

的”舍掉，“有用的”才会多起来。

要充分发挥“警”的作用，就要正确处理“惩”与“戒”、“少”与“多”的关系。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从来态度坚决、立场鲜明。1952年，贪污腐败分子刘青山、张子善被依法判处死刑，有人以其有战功为他们求情。对此，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在反腐败斗争中，只有把占极少数腐败分子绳之以法，才能使大多数党员干部可以引以为戒，维护好政治生态。

“以一警百”是抓早抓小抓苗头，通过敲钟以“案中”人警醒“梦中”人。作为党员干部，当把“警”字铭刻于心，不等组织敲警钟，自己心中的警钟先要响起来，“一念之非即遏之，一动之妄即改之”。心中的警钟不是敲一阵子，而是时时敲、事事敲、处处敲，自我警示一辈子。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这篇旧时儿童都能背诵的《千字文》，作者为南朝梁代的周兴嗣。据传，梁武帝为了教皇子们学习汉字、书法，命人从王羲之书法中选取了1000个零散的汉字，让周兴嗣将其编成一篇完整的诗文。周花了一夜的时间完成了这项任务，累得鬓发全白。这篇《千字文》不但在当时就得到皇帝的高度肯定，很快就在社会上流传开来，而且在此后1400多年中，一直被中国人当作最重要的识字教材，为无数孩童的启蒙教育提供了便捷的工具，甚至远播海外，成为日本、朝鲜等国民众学习汉字的重要教材。

《千字文》作为一本蒙学教材，无疑是成功的。

一方面，《千字文》完整地覆盖了一千个基本汉字，而且毫无重复，因此学习起来效率极高，无论作为识字的教材还是写字的法帖，都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汉字是表意文字，字形和读音的关系比较疏远。汉字虽然总体上数量众多，但常用的基本汉字数量是十分有限的，而且汉字构词能力很强，只要掌握了一千个左右的基本汉字，就能轻松地掌握由它们所构成的几千上万个常用词语，也就具备了基本的读写能力。《千字文》中使用的汉字都取自梁武帝所收集的王羲之书法作品，其总量据说达到了7000多纸。这些书法作品的内容主要是日常应用的各种书信、便条、杂记等，谈论的话题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如此大规模的通用话语语料中所筛选出来的常用字，尽管带有一定的随机性，但其作为基本汉字的代表性，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只要掌握了这些基本汉字，就等于掌握了汉语书面语言的核心。与此同时，这些汉字都是从书圣作品中选取的常用字，历代书法家极为重视，隋代智永和尚、唐代褚遂良、颜真卿，宋代赵估、米芾，元代赵孟頫，明代文徵明等，都曾专门书写过《千字文》。而这些法帖的流布，也进一步推动了《千字文》的使用和传播。

另一方面，《千字文》并不是简单的汉字或者句子的罗列，而是一篇内容完整、结构有序的文章。全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世界景观和上古历史，第二部分讲述道德规范和理想人格，第三部分介绍都城景象和帝王将相，第四部分描绘平民日常和田园风貌，从而构筑了一个现实生活的完整图景，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个人的品位和志趣。一千字的篇幅，不长不短，又采用了四言韵文形式，对仗工

《千字文》：传习千年的识字书

蒋成峰

整、音韵和谐，十分便于记诵。

由于《千字文》字不重出，在缺少注音手段的情况下，背诵下来的整篇文章可作为字

辨，从而很容易造成阅读理解上的困难。为解决这个问题，传统启蒙教育中往往重视专名的学习。例如史游的《急就篇》就列举了一些常见的人名，这些由普通汉字构成的专名虽未必实有其人，却可以帮助儿童了解常见人名的特点，以便在阅读过程中将其与普通名词区分开来。而蒙学教材《百家姓》中，收入的560多个汉字则全是姓氏用字（包括单姓和复姓），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儿童学习这些汉字，除了可以增加识字量之外，同样也可以建立起一种专名的意识。

第二是多用双字词。古代汉语的词多数是单字的，双字词数量较少，而《千字文》中却使用了很多双字词。这里面包括很多联绵词，联绵词中的汉字通常只起表音作用，没有实际意义，例如：枇杷 徘徊 逍遥 洪荒 的历 造次 密勿 绵邈 颠沛 盘桓 委翳

这些词语中，有的在任何条件下都只能两个字一起使用，应该是当初采集文字的时候就一起收入的，如“枇杷”“徘徊”等；有的本来是两个普通汉字，构成联绵词后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成了单纯表音的字符，如“洪荒”“的历”“造次”等。

还有很多双字词，虽然不同于完全表音化的联绵词，但其词汇化的程度已经很高，整体意义并不是单字意义的简单相加，例如：黎首 隐恻 华夏 玆典 丹青 沉默 怀怀 杳冥 稼穡

这些词语在文中都是作为一个整体来使用的，和单字词相比，由它们构成的四字句结构更为简单，整体上也更容易处理。与此同时，词语中单个汉字仍然保持着很强的活跃性，学习者可以很容易地将它们独立使用，或构成其他词语。

第三是少数字词进行简单罗列。编写识字教材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根据字形或字义罗列汉字，很多教材都采用这种做法。《千字文》很少这样做，只有一处例外，即全文最后两句：谓语助者，焉哉乎也。

这里的“焉哉乎也”并未作为语助词（语气词）来使用，而只是进行了简单的列举。表面上看，这是因为前文已经安排精密，在不到一千字的篇幅中已经覆盖了其他所有的字眼，故而这几个词只能作为剩余的“边角料”进行特殊处理的。实际上，语助词本来就是最易安排了的，作者却故意只列举几个，似乎也为了显示一种“余勇可贾”的矜夸之心。